



人大重阳

研究动态

第 36 期

2014 年 2 月 25 日

G20 时代的 GDP 大博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 贾晋京

当前，中国是“世界工厂”，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世界第二，并且很可能在 2020 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然而每当提及这一事实时，一种困扰总是同时被提出来，那就是：为什么世界第二的 GDP 规模没有给中国人带来经济强国的感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柯伟林对此的评论是：中国很强大，但是仍不够自信。

这种困扰的来源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当 19 世纪英国是“世界工厂”时，他们可以用机织的廉价“洋布”使中国手工生产“土布”的农户纷纷破产，使中



国人对何为工业有了直观印象，也留下了十分沉痛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世界工厂”的桂冠已戴在中国头上，而英国的工业则早已衰落，能够用机器化大生产制造出世界上最多种类、最廉价工业产品的国家是中国，而不再是英国，但为什么，中英的经济低位却没有改变，今日的英国仍然是发达国家，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基于这种困扰，人们对 GDP 产生了种种怀疑，出现了 GDP 无用论、中国 GDP 虚假论、中国产业低端论等说法。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需要先把 GDP 背后的故事说清楚。GDP 广受关注的部分只是一个数字，但这一个数字背后的体系却异常复杂，复杂到涉及经济运行的全部环节，而 GDP 的运用则是世界治理策略的大博弈。这是一个涉及到全球工业秩序的发展演化和世界治理机制的核心奥妙的故事，是看清世界体系结构与运行方式的绝佳样本。

GDP 是资本主义的治理工具

发达国家曾经被称为“工业发达国家”，不过这个词已经在各国和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中消失了，因为“工业发达”的地区大部分已不在发达国家。然而，工业已不再发达的国家却普遍维持了“发达国家”地位。这就是现代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之神奇功效，而 GDP 就是这套治理体系使用得最广泛的工具。

GDP 这一“伟大发明”的诞生，与 1929 年爆发的大萧条有关。当时，美国政府只是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钢产量、铁路运输量等指标纷纷剧降等零散



的信息，对于应对危机来说远远不够。1933年就任的罗斯福总统立志采取“新政”克服危机，这就需要建立反映经济运行整体面貌的统计体系。应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商务部联合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在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主持下，开创性地编制了1929—1932年全国国民收入数据。1934年的1月4日，《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由美国商务部呈递国会，这是GDP的生日。虽然当时的“国民收入”（NI）跟后来的GDP还有很大差别，但制定了其基本的方法基础。

GDP基本方法是在对全国经济运行各环节进行记录、货币化评价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而完整的经济账户，加总得到宏观经济的全貌。美国能够建立这一套体系有赖于两个基础：一是工业工程学在全社会的普遍运用，使大部分重要的经济环节都建立了像现代化工厂一样的生产管理系统和财务核算方式，能够对经济活动过程进行记录、存档和标准化管理；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展开，使经济活动都有了货币价格和流通规范。简单来说就是经济活动“有价格、能记录”。

美国能够“发明”GDP的现实基础是20世纪初的“福特革命”带来的大规模制造时代，使美国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工业社会。GDP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治理工具。即便如此，美国真正建立能执行的全国经济核算体系也要到二战时。美国参加二战期间，国内实行严酷的战时经济管制，几乎所有工厂都被纳入军工体系，实行军事化管理。为支持战时经济规划的编制，美国在国民收入统计的基础上，发展出国民生产总值（GNP）。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其三大基本点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DP的统计体系成为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价被援助国家状况的工具，由此得到推广。

联合国从 1953 年起推进的统计体系是英美发展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在当时的冷战大背景下，实际上只在西方阵营的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得到推广。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采用了另外一套统计体系，即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MPS）。两套系统的区别在于 SNA 统计货币化了的经济活动，包括金融业、服务业等；而 MPS 则统计产量，不包括非物质生产的经济行为，其中大部分是只有产量、没有价格的。这种区别反映了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对立：SNA 体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的“一切都用钱来衡量”的社会中才有意义；MPS 则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体中才有意义。

从经济治理的角度看，两大国民经济统计体系都是工业时代的经济管理工具，使政府力量可以深入到经济各环节。而两套体系互不兼容，将两大阵营的经济活动塑造成了“基因”不同的物种，几乎无法相互投资、贸易。

另一方面，治理结构相通也使得两大阵营内部便于进行投资分工与贸易，为此，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结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而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则组成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这是两个相互对抗的经济集团，各自都有一套经济治理机构，其中，SNA 体系背后的全球经济治理力量是现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的世界银行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

西方“霸权红利”的秘密

1991 年苏东解体使全球两大经济治理体系的对立不复存在，由此 GDP 开始“一



统世界”。就在这一年，美国宣布 SNA 的统计结果以 GDP 代替 GNP。这一改变所产生的效果是使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工具的 GDP 出现了一种“妙用”。

苏东解体之后，OECD 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富国俱乐部”。该俱乐部对“准入门槛”给出的标准是：高收入国家，意即高人均 GDP 国家。于是，根据是否 OECD 成员的标准，世界上的国家实际上被分成了两类，两类国家之间的人均 GDP 差距，在 1992 年时为 8 倍。

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该国能够以较少的劳动成果换取别国花费较多劳动得到的成果。道理何在呢？

我们从一个例子说起。据统计，2012 年，英国男士做一次普通理发的平均价格约 10 英镑，换算成人民币的话，超过 100 元。虽然找不到中国的同类统计数据，但可以估计很可能在 30 元以下。英国理发师做的平剪与中国理发师有多大实质区别呢？可以认为区别极小到可以忽略，但价格却悬殊。在英国国内，要考虑这个价格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才能凸显出意义，放在国际上，意义就大了：它可以使英国出口产品的定价很高。

英国是一个进口远多于出口的国家，大部分食品、消费品都依赖进口，而出口的产品却不多，其中出口最多的是飞机发动机。飞机发动机是很昂贵的产品，卖出一台用在大客机上的罗尔斯 - 罗伊斯涡轮风扇发动机赚的钱，大约可以买 17.5 万吨小麦。飞机发动机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是在英国这个高成本的社会中生产出来的；飞机发动机的生产者也要理发，所以理发的价格也会包含在制造飞机发动机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中。正如理发无法出口，大部分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然而包括理发在内的服务业产值占到英国 GDP 的约 82%，其价格参与形



成了可贸易产品的成本，构成了英国昂贵的经济环境。

与英国情况相似，大多数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到其总 GDP 的七成以上，并且大部分服务业的劳动本质上与发展中国家的同行没什么不同，但是却获得了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评价——也就是报酬，于是，发达国家的居民购买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时，就是在用较少的劳动换取了发展中国家付出较多劳动生产出的产品。

OECD 的存在，使得 GDP 有了区分“高劳动低所得”和“低劳动高所得”两类国家的全球治理功能。

“高劳动低所得”和“低劳动高所得”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的产业格局演化有关，世界治理体制的设计一直在不断修正，以维护这种现象并使之显得理所当然。GDP 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由于苏东解体的推动，1992 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分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两件事分别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和前苏东部分地区融入西欧市场经济体系。这就使全球产业大转移的过程大大加快。曾经的“工业发达国家”，纷纷把制造业转向了中国等东亚地区和前苏东集团国家，逐渐变成了以金融方式控制海外资产的经济“虚拟化”国家，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占比越来越大。GDP 代替 GNP 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好处是：由于资本的高速流动特性，本国国土上会有大量金融资产属于外国公民所有，GDP 统计可以包含这一部分，使本国维持“高收入国家”地位。并且，由于 GDP 无需在境外进行统计，因此不会受到不同国家统计规则不同的影响，比 GNP 更适合作为全球统一推广使用的工具。



此后，西方国家实际上可以“不事生产，印钞购物，坐享其成”，金融带来巨大“霸权红利”使西方国家经济越来越虚拟化，结果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被中国改变的世界秩序

随着集装箱运输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迅猛发展，把产品分解为多个部件在全球进行制造和组装有了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兴建海外制造基地的浪潮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兴起。跨国公司根据各个国家的成本状态来协调生产和分配任务，从公司和行业内部进行生产的组装活动中诞生了离岸生产和生产地的转移。而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则使一个人口超过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块头”参与到了全球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离岸外包的任务从“部件 - 组装”升级为可以向全球委托任何分工环节，即从货物贸易发展为任务贸易，由一国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成为了“世界工厂”。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GDP 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起初采用的是 MPS 框架。1979 年中美建交之后，为了能够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中国开始学习 SNA。经历了 5 年多时间和庞大的培训、组织和换思路工作，中国于 1985 年开始试行发布 GDP，并于 1993 年起完全以 GDP 代替 MPS 数据。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治理体制开始能够跟西方世界进行接轨，而这其中的微观经济管理方式改变过程，也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

承接西方的制造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进入了 GDP 增长的“快车道”，



出现了“中国奇迹”。“中国奇迹”的核心并不在于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多的工厂，而在于中国形成了无可匹敌的“工业生态”。

使用“工业生态”一词，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美工业现状的差别。2011年2月，奥巴马总统曾经问乔布斯：能不能在美国建苹果手机生产线以解决就业？乔布斯回答说：技术上来讲完全没问题，但需要8000多名工程师，在美国招募这么多工程师至少要9个月时间，但在中国只需要两周，这就决定了生产实际上只能在中国进行。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从“生态”角度来理解工业体系“活性”的重要性。美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多年的工业外移，已经失去了大量中低端环节，工业体系的“活性”大大降低。这一方面与工业中大量环节流失，剩余的部分难以“连缀成网”有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掌握技术的人员没有一直处在不断工作的团队中的话，要想重新“找回状态”也很困难。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生态”相当富有活力。这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大部分工业岗位就业人员都处在“有活干”的状态。在技术发展使得最终产品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大部分工业产品的生产都会涉及到数以千计的生产环节，从工业生态的角度来看，其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只能在中国生产。并且随着中国自身工业生态的完善，中国的制造能力必然会向产业高端和自主研发提升。

在中国形成世界最完整的工业生态过程中，GDP快速提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随着工厂越来越多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工业化管理也越来越普及，使得经济活动“有价格、能记录”。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实际上也有大量的经济活动由



于管理体系尚未被工业化，难以被记录，因此中国的 GDP 实际上是长期被低估的。中国的真实 GDP 肯定比 SNA 统计出来的数值要高得多。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你购物时是不是很多时候没开发票？

为什么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却仍然要出口廉价的工业产品给发达国家呢？答案还是在当代世界治理体系中。GDP 是产业世界治理体系的“治权”，属于各国政府；而世界产业治理体系的“法权”则是知识产权体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不是各国国内的，而是跨国的。笔者曾撰写《全球产业重组与知识产权博弈》一文论述知识产权的基础是“市场相互准入”，承接别的国家的委托生产任务，要求尊重其知识产权，缴纳知识产权费用，否则就是“山寨”，不能向国外销售。而为了能够获得市场，实际上就必须接受对方的定价。在这样的世界治理体系中，OECD 实际上成了一个相互“尊重知识产权”的共同市场，使得“山寨品”几乎找不到出口市场。

中国的崛起从两方面改变了世界秩序，一方面是导致了全球产业重心的转移，但西方国家仍可以凭借“高人均 GDP 优势”贱买贵卖；另一方面，中国产业升级和人均 GDP 的增长使得西方的特殊地位越来越难以为继。

中国需要修改游戏规则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西方国家蓦然发现，过去的游戏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随着全球产业格局的变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曾经占据全球 GDP 总量 70% 以上的“西方七国”（简称 G7，包括美、英、法、德、日、意、加）到 2008 年



下降到了 50%，并且还在快速下降。而一些原先的发展中国家 GDP 则随着工业发展而快速上升。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新兴市场自己组织起来，不带发达国家玩了”的局面。

于是，2008 年美国邀请了全球 20 个最大经济体的首脑到华盛顿开会，共商应对金融危机大计。这样 G7 扩展成了 G20，世界秩序进入了新的时代。

G20 时代是全球化生产的时代，虽然政治上国家区分彼此，但经济上生产链条却是全球一体，共享同一个微观经济基础。这样，基于一国国内统计的 GDP 就无法客观描述经济面貌了。由此，各种修正 GDP 的方案出现了，其中有着重大影响有三种，每一种方案背后都蕴藏着极深的谋略算计。

第一种是在 G20 框架下基于“全球价值链”议题的“贸易增加值算法”。其思路是：中国有一半左右的贸易量来自加工贸易，也就是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制成后直接出口。中国企业在该过程中只获得了很少的加工费用，但却在数字上造就了庞大的出口量。因此，中国的出口额应该根据“贸易增加值”进行核减。核减后中国的 GDP 将降低。

第二种是美国进行的 GDP 统计方法改革。2013 年 4 月，美国宣布将调整 GDP 统计内容，把研发支出、电影版税等“21 世纪的组成部分”纳入。根据这种新算法中，企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研发费用支出将被视为固定投资，有关娱乐、文学及艺术原创支出也将作为固定投资纳入 GDP。经过这种调整，美国 1959 年至 2002 年的 GDP 水平平均提高 2.6% 至 4.6%，其中 1995 年至 2002 年增长更是高达 6.7%。

第三种最为重要，是联合国框架下推进的“绿色新经济”框架。2012 年 6 月



20—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此次大会被命名为“里约+20”（Rio+20）。“里约+20”被联合国官方定义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活动”，超过12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寻求解决“地球的环境与资源不足以支撑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式”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里约+20”推出包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核算的“绿色经济”框架，改变只计算经济活动的GDP。评价社会资本的方式是“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体系，衡量“自然资本”的方式是自然资本核算体系。根据这一思路，GDP将被纳入“国民幸福”内容，并减去自然资源损耗。联合国宣布，计划在2014年7月，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70周年之际，再举行一次大会，届时各国将宣布接受并采用“国民幸福总值”和自然资本核算，以代替现行的GDP体系，到2015年则要开始具体落实。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可能会面临“国民不幸福”的困扰，并将从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

GDP背后蕴含的其实是经济运行体系、治理方式和发展理念。中国的GDP提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提高中国人在全球经济生态链中地位的过程，直接对西方人“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构成挑战。因此，应该看到，中国的GDP总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二，并且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但这只是以“打工”为主的收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没有本质上升。因此，中国需要寻找更能刺激其经济地位提高的指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电话：010-62516305

官方网站：rdcy-sf.ruc.edu.cn

邮箱：rdcy-info@ruc.edu.cn

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公众微信号：rdcy2013